

融通中西哲学的
王国维

RONGTONG ZHONGXIZHIXUE DE WANGGUOWEI

● 赵庆麟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82719

融通中西哲学的
王国维

RONGTONG ZHONGXIZHIXUE DE WANGGUOWEI

● 赵庆麟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闵 敏

融通中西哲学的王国维

赵 庆 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3,000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5—731—6/K · 105

定价: 4.00 元

2628/14

目 录

[1]	前 言
[7]	第一章 欲知其人必先论其世
[22]	第二章 性、理、命不过一空虚之概念
[68]	第三章 万物之有理 存于人心之有知
[86]	第四章 事物必尽其真 道理必求其是
[110]	第五章 人生苦局促 俯仰多悲悻
[128]	第六章 世无明王 栖栖皇皇
[147]	第七章 培养德智体美完全之人才
[180]	第八章 美在形式
[253]	结束语
[254]	附 录 参考书目

前 言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有识之士，不甘于屈辱的地位，纷纷谋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新思想，祈求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王国维即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更重视改变中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和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思想的介绍、吸取、批判和融合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思维方式，在哲学、教育、艺术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开创新的实证科学的方法，在一些新学科方面也有不少创获。

王国维(1877~1927) 中国近代杰出的学者。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永观。在哲学、美学、文艺、史学、小学等方面的研究中都有可观的成就，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王国维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具有传统文化的海宁盐官镇。他的父亲王乃誉，早年习儒，爱好金石、书画，后弃儒经商，同时又关心时政，幕游溧阳，这对王国维的影响很大。如甲午战争后，因他的父亲推荐而看到康有为等的《公车上书》，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王国维六岁入私塾，十六岁为秀才，两次乡试未中，此后慨然弃绝科举，自奋“新学”。1898年到上海，进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馆为书记、校对；业余就读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在东文学社时，从田岗佐代治书稿中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时务报》停刊后，王国维曾先后为湖北农校翻译，主编《教育世界》，在通州师范学堂和苏州师范学堂讲授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对哲学和教育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写

了不少论文和译著。1906年到北京，为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兼任学部图书馆编辑，并研究诗词、戏曲。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从事甲骨文、古史地研究，并编辑《国学丛刊》。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哈同花园编辑《学术丛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通讯导师，并汇编《观堂集林》。1923年充当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整理大内图书。1925年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五十一岁。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1905年（三十岁）以前，主要从事哲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康德、叔本华的主观唯心主义为他的主导思想。中期即1906年至1911年，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戏曲史的研究。在哲学方面对康德、叔本华哲学产生了“可爱者不可信”的矛盾，而逐步趋向唯物主义。后期即1912年至1927年，以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小学和古史地，取得不少开创性的成果。综其一生，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辉煌时期是在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①“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②之后。

王国维没有撰写过完整系统的哲学巨著，但他的哲学思想却非常丰富，好像散珠璞玉，蕴藏在各学术论著中。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的介绍、比较中得以反映。早期，他倾向于康德、叔本华、尼采，而否定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观点。反映出他赞赏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反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而趋向于唯意志论。但至中后期，他的哲学观点发生了变化，从唯意志论转向唯物主义，或

① 《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册。

②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册。

者讲含有较多的唯物主义。这是他哲学思想特点之一。二是在清理中国传统哲学中反映出他的哲学观点。他运用西方唯意志论哲学批判程朱理学，否定天理的客观实在性；接受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同时吸取戴震的部分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由于他以唯意志论批判程朱理学，就不可能在同时坚持和完整地接受戴震的唯物主义因素，最后又回到主观唯心主义。三是在对美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小学、古史地等的研究中反映出他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四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面比较宽泛，吸收和研究西方哲学缺乏系统与深度，就不免出现芜芜混杂，自相矛盾的现象。他在介绍、引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时，常常阐发己意而与叔本华本义有所出入；有时在同一著作中出现相互矛盾的论点，从而显示出他的哲学思想不成熟的一面。不过王国维运用西方的哲学理论，研究分析中国文化，把中西不同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对后人有着启迪的意义。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融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在晚清时期，尽管西方文化东渐，但是纯粹从学术角度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学者极少。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革命。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无暇顾及所谓纯哲学即思辨哲学的研究。时而涉及哲学也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王国维不参与政治斗争（当然不是说他没有政治观点），他以学者的身份对待古今中西之争，而且他研究哲学，主要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之际，国内哲学理论研究正出现了一段“空白”之时。这时，改良派思想家的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罹难，严复转向教育和译著；而革命派的孙中山、朱执信、章太炎等或奔波于海外，或被捕入牢狱。王国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于“纯哲学”、“纯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填补了国内这段时期哲学研究的空白。

王国维，在近代哲学革命中的主要贡献，一是继康、梁、严复之后介绍西方哲学的学者，尤其是对于德国哲学的介绍。严复所及的西方学术，主要是英法的著作，侧重于社会学、逻辑学，按王国维说法：“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兴味之所存，……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①康、梁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更是肤浅，正如梁启超解释“新学”所说：“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的‘新学’就是三种元素混合构成。”^②（“三种元素”指外国的、个人的以及各经正文和周秦诸子的。）所以康、梁谈不上真正介绍西方哲学。王国维不仅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而且还译编了德·海甫定(Hoffding)《心理学概论》、英·器文(Jevons, 今译为杰文斯)《辨学》(即《逻辑学初步》，严复1908年译为耶方斯《名学浅说》，王译于1909年)以及《教育学》、《西洋伦理学史要》等。此外，他除了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及其部分著作外，还比较全面地介绍如歌德、席勒，以及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些德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

二是提倡思辨哲学，重视哲学研究的久远价值，促使哲学理论向纵深发展。他分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差异，认为我国的思维特质是“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③还认为以往的哲学研究强调“经世致用”，致使

① 《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册。

② 《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中华书局版第15册，第22页。

③ 《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册。

哲学不能深入发展；程朱理学被官方定为一尊，入主出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是一种死哲学。为此，他要求把哲学从政治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为一时之政治目的所左右，以改变我国民族的思维特质，深化哲学研究。这里王国维强调哲学脱离政治，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期望哲学研究要加强深度还是可取的。此外，王国维提倡纯哲学，彻底否定程朱理学，促进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我国传统哲学，批判程朱理学，为近代哲学革命起到了清道作用。他循史概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将中国文化分为“能动”、“受动”、“抱残守缺”几个时期，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是“能动”期；佛教流入中国与固有哲学相结合，出现了“受动”期；孔子被定为一尊以后，即是“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时期。^①最后一段时期，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对此，他要求能有谭嗣同敢于冲决封建道统束缚的精神；要像苏格拉底服毒，布鲁诺被焚，斯宾诺莎破门，康德被解职那样来对待学术。王国维本人也就是以此精神来批判官方哲学从而否定“理”的客观实在性而宣传唯意志论，强调个人的作用。这对当时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和哲学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郭沫若说他“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发，言腐儒所不敢言”。^②

四是第一个在中国将美学独立为专门的学科。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进程中，贡献之大，也莫过于美学。他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学者。他不仅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理论，同时还介绍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

① 《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影印本，第 5 册。

② 《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4 页。

博克、洛克、休谟，法国的经验主义美学理论，并以此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有的作品，甚至被提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如《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等。《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比较突出的美学著作，其论述了文学艺术创作、评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境界说”，强调“真”和“自然”。《宋元戏曲考》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合理思想。另外，他又结合中国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提出了“古雅”说。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康德的超功利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对我国美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致都没有越出他的范围。”^①

五是重视形式逻辑和吸取西方实证科学与乾嘉学派考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学、史学的研究。他不仅在分析批判“性”、“理”等传统观念时运用了逻辑方法，而且在文字学、语言学以及史学的研究中运用逻辑方法，且多有创新，如“二重证据法”，即是以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的科学方法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王国维所用之方法，“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②

王国维对近代中国哲学的贡献，蔡元培曾作过如下的评价：“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③但是，过去的学者较多地注意他在史学和美学上的造诣，疏忽了他在哲学领域的贡献及他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本书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以多种视角考察、总结王国维在融通中西哲学所作的贡献及其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① 《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②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册。

③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页。

第一章 欲知其人必先论其世

“由其世以知其人， 由其人以逆其志。”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也就无法了解王国维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患频仍，国势日弱，社会动乱，新旧交替的时代。从他步入社会到逝世的三十年中，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等社会政治剧变；在学术上也相应地出现了新旧思想激烈的交锋。这些对他的整个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 清末政治经济概况

王国维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清王朝从岌岌可危到覆灭的时期。清王朝统治走下坡路是在乾隆末年开始的，至嘉庆、道光逐渐衰落。其间因封建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的闭关自守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矛盾日益加剧，并发生了多次冲突。而1840年英帝国主义公然为保护鸦片贸易为由派兵入侵，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自此以后，觊觎已久的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自1842年至1901年先后签订了20余个大小条约，每一个条约都饱含着中国的耻辱和人民的血泪。王国维对此极为沉痛地说中国“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①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而这些战争赔款、外债内债，除出卖主权外，很大一部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在1887年、1896年、1899年几年里大规模增加税收，再加上地方官吏层层盘剥，正是“无地不征，无物不税”。康有为在1895年上皇帝书中说：“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①所谓不可言者，就是指人民群众揭竿而起，造政府的反。

自1841年到清政府灭亡，大小起义上百起。其中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自1851年到1866年长达16年之久，遍及大半个中国。清政府不得不动调大部分兵力进行镇压。而捻党的斗争自1841年起，一直持续到义和团起义。最后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19世纪60、70年代，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遭到镇压后，统治集团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兴办工厂、制造枪炮，主要发展军事工业，用以镇压人民。但由此开端，客观上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洋务派张之洞，80年代在广东、湖北等地开煤矿、建钢铁厂、织布厂等，其中汉冶萍煤铁公司影响尤大。其他以民营为主的，如张謇的大生纱厂、大达轮船公司等民营企业。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自50年代开始出现，到70、80年代明显地增多起来，民族资本得以逐步发展，由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早期工业无产阶级也逐步地形成。

在政治制度方面，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深感到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体制是没法维持下去的，因此出现了早期和后期的改良主义。早期改良主义代表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他们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民族

^① 《戊戌变法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册，第145页。

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王韬认为只有效法西方，实行变法才能自强。郑观应提出“商战”，鼓励振兴民族工业，把工商人士提高到与士大夫同等的地位；并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他们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他们把实现这些要求的希望都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身上，并表示他们只是“敢谏之木，进善之旌”^①发表发表议论而已，因此没有发展成政治运动。

后期改良派——维新派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愿望，并前进了一大步。在经济方面提出设立农工商总局，路矿总局，邮政局等，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强调变法图强，维新救国。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改变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在政治方面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实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并提出了“统筹全局”的实施办法：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下设十二个分局，分别制定和推行各项新政。他们自1895年“公车上书”后，在舆论上、组织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北京、上海建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掀起了维新运动，并得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的支持。出现了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但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下很快就失败了。康、梁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由此证明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维新派与早期改良派虽然走的都是改良主义道路，但维新派的影响所及是早期改良派所远远不能相比拟的。由于维新派在舆论上组织上做了不少工作，曾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王国

^① 《盛世危言序》，《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36页。

维在海宁家乡时即从他父亲手中看到了“公车上书”疏论；后在《时务报》任职时同情支持戊戌变法。对“六君子”就义深表同情，曾非常愤慨地指责顽固派攻击变法：“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①

至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发布《变法上谕》，提倡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派留学生；组织新军。1905年又开始了所谓“宪政运动”，提出了开议院，废科举，汰冗员等新政。但在1908年的《宪法大纲》的条例中明确提出“君上大权”。

这种“宪法”对君权毫无限制的作用，实际上是保障君权的宪法。这一时期王国维正在北京学部供职，他对这种“立宪”态度极为冷漠，在文章中强调言论自由，发扬民意，而表现出资本主义倾向。同时，他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把革命领袖称为“不逞之徒”。他说：“不逞之徒何地蔑有，昔之洪、杨，今之孙、陈”，^②辛亥革命后，他流亡日本，自称“亡国之民”。^③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三百年的统治，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溥仪退位以后，即出现了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好像走马灯，不断更换。王国维对这些新官僚的腐败无能，颓废贪婪非常感慨：“现在窃钩窃国同一无罪，此后不为安南、高丽人不可得免。”^④袁世凯称帝，爆发了护国战争；张勋妄图扶持溥仪复辟，又发生了护法战争。而南方地方军阀之间亦经常以兵戎相见；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之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8页。

② 《静庵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册。

③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页。

④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8页。

间，在1920年至1924年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连年的战争，政治的动乱，地方军阀横征暴敛，军费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对此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王国维深为感叹，感到前途无望。

从国际上来看，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及其腐朽性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上升发展走向没落衰亡。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11月又出现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王国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上的倒退，他认为：“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子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并论：“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①而对俄国十月革命更为仇视，把俄国共产党称为罗刹，要大家防止这个“传染病”。^②

二 思想学术背景

王国维曾经论述过清代学术的变迁。认为顺、康之世，“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后“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③王国维虽然于此叙述了清代学术变化的概况，但是学术思想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机械地与时势完全相一致。即使在考据之学兴盛之“雍乾盛世”，已经潜伏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危机。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一方面进一步利用程朱理学作为统治人民的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5、311页。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1、288页。

③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4册。

思想工具，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的依据，另一方面又鼓励考据学派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考据学在当时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术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①成为时髦的学问。但是汉学（考据派）与宋学（程朱理学）两派在学术上并不一致。宋学派攻讦汉学派“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为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逆。”“推之民人国家，了无益处。”^②汉学派指责宋学：“宋人则恃胸臆为断，……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③实质上这两派都对封建统治有利，不分彼此，陈澧就认为治经不应为汉、宋门户所限，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而应加以统一。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使中国封建制度濒临瓦解的境地。汉学、宋学都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因此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就寻找新的强国御侮的途径，而出现了今文经学运动。今文经学是以公羊经义议论时政的。清代公羊学派自庄存与、庄述祖开始，继之刘逢禄、宋翔凤（常州派），而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中坚。他们感于国势式微，忧危虑深，运用公羊学专讲微言大义的办法来议论时政，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根据公羊学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加以引申，主张“更法”。龚、魏的学说，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特别对维新派的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说的，读《定盦文集》好像触电一样。晚清的学术思潮可追溯到龚、魏那里。王国维亦曾评述公羊学情况说：道咸以降国势不振，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全集·专集》，中华书局版第17册，第24页。

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璦人，魏默深之传，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①龚、魏的公羊三世说，没有越出旧学的窠臼，龚、魏以后由廖平、康有为继之。康有为借此明确提出“托古改制”。

与今文经学运动同时，唐鉴、倭仁、罗泽生、曾国藩等却继续维护封建道统，宣扬程朱理学。唐鉴著《清学案小识》鼓吹清朝的理学“道统”，欲挽救理学的衰微。道、咸、同治之间，宣扬程朱理学最为突出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曾从唐鉴考问学业，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还自诩为孔孟之道“道统”的继承人。

上述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中西学术之争。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思想开始重视起来。自40年代至70、80年代，林则徐主编《四洲志》、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现状，并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以后在洋务派的倡导下，于1863年以后，先后设立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学习外国语言，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翻译有关科技书籍。甲午战争后，各省、州、县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等。中国近代第一批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以及詹天佑等，他们从外国引进近代数学、物理学、

①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4册。